后现代主义兴起的社会背景分析

杜以芬

(济南大学 法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22)

摘要: 作为一场范围广大的思想运动,后现代主义的产生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后现代主义是社会进入到后工业阶段的产物,是继现代主义理想的破灭而出现的,同时也与传统科学形象的解体密切相关。由于产业结构、社会生活、意识形态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矛盾暴露无遗,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后现代主义应运而生。

关键词: 后现代主义; 兴起; 社会背景

中图分类号: B15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3842(2011)01-0068-05

20世纪中后期,后现代主义的突然崛起和迅速传播是现代西方学界中最重要的一件事。作为一场范围广大的思想运动,后现代主义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而持久的。其原因就在于它不仅触及了西方文化的根本,而且也体现了西方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人类的生存方式的变化是人类的哲学思维方式变化的根本原因,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它的产生与其所处的时代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作为“后现代主义”主要理论家的詹明信,在本质上把后现代主义看作是一种社会批判理论,从资本主义社会自身发展的角度对后现代主义进行了理论反省。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书中,詹明信指出,后现代主义这个概念就其正确的用法来说,“它并不只是用来描述一种特定风格的另一个话语。至少在我的用法里,它也是一个时期的概念,其作用是把文化上新的形式特点的出现,联系到一种新型的社会生活和新的经

济秩序的出现——即往往委婉地称谓的现代化、后工业或消费社会、媒体或大众社会,或跨国资本主义”^{[1](P399)}。“我相信,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和晚期的、消费或跨国的资本主义这个新动向息息相关。我也相信,它的形式特点在很多方面表现出那种社会系统的内在逻辑。”^{[1](P418)}

那么,资本主义进入后工业社会的标志是什么呢?后工业社会是一种怎样的社会?在一些后现代主义研究者看来,资本主义进入后工业社会的标志是消费的地位和本质发生了变化。以提出消费社会理论而跻身于当代著名社会学家之列的波德里亚,在其著作《消费社会》一书中就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活动进行了符号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在波德里亚看来,“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2](P1)}。“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2](P2)}在这

收稿日期:2010-09-12

作者简介:杜以芬(1975-),女,山东沂南人,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学、哲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维度探析”(09CSH001);济南大学校级课题“后现代知识观对社会工作教育的启示”(X0811)。

种为物所包围的时代中,人成了官能性的人,即人们是根据物的节奏和不断替代的现实而生活着的。在没有论证和证实之前,波德里亚就针对马克思所强调的生产的重要性而暗示了消费在社会组织和社会行为中的重要作用,即消费原本是为了维持人的生存和发展的一种经济行为,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力极大增强,物质财富极大增加,消费的目的不再仅仅局限于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而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符号消费和象征性消费的文化活动。为了实现资本主义生产扩张的需要,同时也为享乐合理化制造理由与条件,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以休闲、享乐为目的的消费需求代替了以改善生产条件、更新商品制造设备、发展重工业和基础设施、培养生产技能的生产需求。在这一过程中,人们注重的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其所代表的品牌和形式,正是基于后工业社会的发展由生产转向消费的变化,布迪厄等人提出了声望经济的说法。而在这种消费过程中,其所体现的不是人与人之间的身份上的平等,恰恰相反,“人们从来不消费物的本身(使用价值)——人们总是把物用来当作能够突出你的符号,或让你加入视为理想的团体,或参考一个地位更高的团体来摆脱本团体”^{[2] (P48)}。符号消费变成了社会分类和区分过程。

丹尼尔·贝尔对后工业社会的经济发展也作了类似的评价。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贝尔把现代社会看作是由三个遵从不同轴心原则的特殊领域(经济—技术体系、政治、文化三领域)组成的。经济—技术体系领域遵从的轴心原则是功能理性,遵守的是少投入多产出的生产要求,通常以金钱形式来反映在成本和收益方面的对比,由于这一体系本身是具体化的世界,它强调最大限度、最佳选择以及对雇工和原材料混合的同样处置,所以在这个世界中,人被视为物件或“东西”,造成了只见角色,不见人的异化现象。政治领域的轴心原则是合法性,政治行动的基本目标是调和冲突和不相容的利益要求,或寻求覆盖性条令及宪法允许的权威立场,它实现目标的手段主要是依靠谈判协商或法律仲裁而不是技术官僚的理性判断。文化领域的轴心原则是不断表现并再造“自我”,以达到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它的目的在于为人类的生存提供意义。^{[3] (P56-60)}由于这三大领域“之间并不相互一致,变化节奏也不相同。它们各有自己的独特模式,并依此形

成大相径庭的行为方式。正是这种领域间的冲突决定了社会的各种矛盾”^{[3] (P56)}。这种冲突随着后工业化社会的到来而变得难以遏制,最为严重的断裂和冲突发生在经济基础和文化领域。在经济主宰社会生活、文化世俗化、商品化日趋严重、高科技变成当代人类图腾,反过来压迫人的局面下,资本主义无法再为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提供终极意义的支撑,由此产生了信仰危机问题,用贝尔的话说就是“现代主义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一种精神危机,因为这种新生的稳定意识本身充满了空幻,而旧的信念又不复存在了。如此局势将我们带回到虚无。”^{[3] (P74)}

二、现代主义理想的破灭

“一般而言,后现代批判认为,一切现代社会理论都源自于启蒙理想对科学和理性所持的未加批判的信念。”^{[4] (P26)}现代性是作为能够把人类从愚昧和非理性状况中解脱出来的进步力量而登上历史舞台的,但在实现现代性计划的过程中,现代性自身成为消极、压迫、压制之源、异化之本。从这个意义上说,后现代主义继现代主义理想的破灭而出现。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曾经指出“人们用以生产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需要的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应当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来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5] (P25)}后工业社会所反映的生产方式是一种与消费文化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在这样的生产方式下,人并没有实现现代主义所允诺的理想,即人类可以通过掌握真理,来实现人类解放的理想。实际情况是,在后工业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走向了现代理想的反面。

继《逃避自由》之后,弗罗姆的《健全的社会》一书围绕异化概念对20世纪民主制度下的生活进行了精神病理学的分析。弗罗姆指出,尽管生活在20世纪西方世界的人都自认为精神十分健全,但从精神病学的观点来看,“在最近的一百年中,我们这些西方人创造了比人类历史上任何其他社会都要巨大的物质财富,然而,我们也在称为‘战争’的方式中屠杀了数百万的同胞。除了一些小型战争外,我们在1870、1914和1939年进行了大规模的战争……1955年,我们正在为一场大

屠杀做准备 这次屠杀的规模将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次。自然科学领域中最伟大的发现之一为这一目的做好了准备”^{[6] (P11-12)}。而根据几个最重要的欧洲和北美国家所做的自杀、他杀和酒精中毒的统计数据显示,“最民主、和平和繁荣的欧洲国家,以及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 精神失衡的症状最为明显”^{[6] (P17)}。这些事实和数据引导弗罗姆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努力奋斗的目标是否从根本上出现了问题。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他赞同弗洛伊德的观点,认为一个健全的社会应该是一个符合人类客观需求的社会,而当前“社会精神病”的出现,则是因为文化和文明的发展越来越背离人类的需求。

追求自由、民主一直以来就是西方传统的价值理念,但由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单向度的社会,所以生活在单向度社会中的人仍然处在压迫之中。“当一个社会按照自己的组织方式,似乎越来越能满足个人的需要时,独立思考、意志自由和政治反对权的基本的批判功能就逐渐被剥夺。”^{[7] (P3-4)} 马尔库塞认为发达工业社会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它有效地窒息了那些要求自由的需要,并且是通过借助科学技术的进步来实现的。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科学技术虽然在现代生产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科学并不是万能的,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没有带来一个美好的时代,相反,由于资本主义把科学技术专利化和产权化,使之成为对金钱、权力和新奇事物孜孜以求的无穷欲望。原先人们对它投以的巨大希望已逐渐变成失望,生活的总体性破碎成由狭隘的专业知识照管的独立的领域。过去几个世纪以来,人类为之奋斗的理性、科学、民主、自由、博爱等梦想已经失去了对人们的号召力,实际情况是过去所有的哲学和科学理论对人类现实的基本困境,如犯罪、孤独和疾病等是无能为力的,它们并不能带给人精神安慰。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由于资本主义宣扬人的主体性和人类中心主义,使得人和自然的关系被理解为统治和被统治、改造和被改造、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自然不再向人类露出神性的笑容,而人类对自然的无限制索取,严重破坏了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地球变得越来越不适合于人的生存。20世纪60年代,罗马俱乐部率先提出了“人类困境”问题,指出增长是有极限的,人类困境的实质是人的内部危机。而“在《增长的极限》在欧美产

生强烈反响的同时,西方新马克思主义业已完成从哲学批判到社会学、政治学批判的转向。新马克思主义把生态危机同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发展联系起来,同人类解放联系起来,指出资本主义通过‘过度生产’和诱导人们‘过度消费’来维持其寿命,这必然导致生态危机”^{[8] (P9)}。

无论从人与人的关系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改善来看,科学技术的应用都没有带给人们自由和解放,相反却导致了人的异化和自由的丧失,导致了对精神文明和道德信仰的忽视,工具理性主义膨胀,人文价值失落;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紧张等。正如霍克海默与阿尔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指出的那样“从进步思想最广泛的意义来看,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但是完全受到启蒙的世界却充满着巨大的不幸。”^{[9] (P1)}

三、传统科学形象的解体

在哲学发展的历史上,哲学与科学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与科学形象的解体密切相关。

在近代,科学一直以其逻辑严谨、建构精密而成为哲学向往的楷模。康德甚至把科学视为能够证明科学的形而上学存在的例证。他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幸运地慨叹“虽然我们不能承认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是实有的,但是我们有确实把握能说某些纯粹先天的知识是实有的、既定的,例如纯粹数学和纯粹自然科学,因为这两种科学所包含的命题都是或者单独通过理性而带有无可置疑的可靠性,或者一般公认是来自经验却又独立于经验的。这样我们就至少具有某种无可争辩的先天综合知识,并且不需要问它是不是可能的(因为它是实有的),而需要问它是怎样可能的,以便从既定知识的可能性的原理中也能够得出其余一切知识的可能性来。”^{[10] (P31)}而在胡塞尔那里,正如他的《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一书的标题所显示出的,他的理想就是把哲学建成像科学一样严格的科学。但对科学所作的研究表明,这种传统的科学形象已经不再是无可置疑的了。1905年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的发表,改变了人们旧有的思维观念。康德视为纯粹直观的时间和空间并不是绝对的,1927年海森堡不确定性理论的提出,更加深了这种思维观念。歌德尔数学定理的提出表明,自毕达哥拉斯以来就被认为是科学的数学也无法证明自身的统一性和一致

性。^{[11] [P21-22]} 随着人们对科学发展的研究,传统的科学形象受到了置疑,弱化知识社会学的提法,反映了这种科学形象变化的现实。^①同时,由于科技革命的发展,信息量激增,“知识爆炸”,新兴学科不断增多,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寻求单一、确定不变基础的传统哲学已经失去了现实解释力。这在客观上促使人们进一步反思和批判传统哲学,提出彻底解构、摧毁基础主义的主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兴起,随着电视、电脑的普及,知识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发展,贝尔在他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有几个数字可以形象地反映出这种知识的发展:“正如《大英百科全书》第11版的前言所提到的,在早期诸版(1744-1785)中,本书之编辑,一如前代,只需用12人之力,整个人类的知识便尽收眼底;而1967年的那一版,光是编辑准备工作,就动员了一万名著名的专家。”知识爆炸的结果导致了知识分类界限的模糊,美国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曾经担心地写道:假设科学每10年将其复杂度和难度提高二至四倍,那最终将导致无人能了解科学。同时知识的爆炸还导致了旧的知识体系的崩溃,也就是“整体的支离破碎”,而把所有的知识体系看成是易碎易破的,则是一种非常后现代的态度。^{[11] [P16-17]}

在传统哲学中,科学被认为是无主体的、与价值无涉的,因而是客观的,但在后工业社会,知识的生产遵循的不是科学为自己规定的原则,而是体现了经济社会追求效益和利益的原则。“现今的学术知识生产,已和各种社会权力/利益体制纠缠在一起。不仅大规模的知识生产是为功利的社会国家目标,乃至特定社会阶层的利益服务的,而且学术体制的内部结构,学术发展的规划,都受制于学科门类的偏见,及这些偏见所体现的权力和利益关系。”^{[4] [P100]}

由于近代以来的西方主流哲学把知识的客观性理解为对不依赖于心灵的外部实在的符合,所以主张知识必须建立在“符合事实”的基础上。自笛卡尔确立了二元论的思维方式到康德以前,“事实”均被看作来自于事物本身,它的客观品质是由外部世界保证的。康德打破了这种神话,揭示了“自在之物”(客观世界本身)的不可知。在

《理性、真理与历史》一书中,普特南建议“我们读康德时最好把他理解成第一次提出我所谓的‘内在论的’或‘内在实在论’的真理观的人,尽管康德本人从未道破这一点。”他指出“主张真即符合的理论当然是最自然不过的理论。康德以前,要找出任何一位不持有真理符合论的哲学家,是不大可能的。”康德虽然也承认存在着某种不依赖于心灵的实在,但这一被他称为“物自体”或“自在之物”的东西却是不可认识的,我们对它不可能形成实在概念,我们所能谈论的只是为我之物,这种不依赖于心灵的实在仅仅是理性的一种公设。追随康德的现代经验主义者们虽然拒斥传统的形而上学,力图在现象世界中为事实的客观中立寻找根据,但由于他们仍然把“符合事实”作为自己的理论追求,所以并没有真正摆脱他们自己所要拒斥的对象,其所理解的“事实”的客观性仍然来源于对人类的文化、历史、语言的无涉,这种关于客观性的理解对于西方文化影响深远,知识的一切部门乃至文化的一切部门均以“符合事实”作为自己的理想与追求。伯恩斯坦也指出:自从“认识论”出现并对先验哲学做出严肃的尝试以来,哲学的整个历史就是客观主义的哲学与先验哲学逐渐极端紧张的历史。它是为维护客观主义并将之在新形式中发展的不断努力的历史,另一方面也是先验主义为克服先验主观性观点及要求的方法遗留下来的困难而不断尝试的历史。

而近代哲学之所以如此执着地追求这种纯粹客观的真理是因为深受科学思维方式的影响。如果说胡塞尔时期还是认同科学的客观性的话,那么随着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人们已经发现了在科学领域中也不存在所谓的与人无关的纯粹客观性。20世纪70年代中叶,随着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科学所具有的这种客观性也成为有问题的。以大卫·布鲁尔为代表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派不仅强调知识在形式方面具有相对主义特征,而且进一步强调知识内容的相对主义特征,尤其强调“社会维度”对知识形成的影响。由于把知识当作基于社会意向而形成的、受具体社会情境决定的信念,因而它认为包括科学知识在内的所有各种知识都是相对的,不具有任何客观性和确定性。其所造成的后果就是,人们会因此从

① 科学社会学萌芽于1930年代,直到1970年代后期,西方科学社会学的发展才出现重大转变。1970年代初英国爱丁堡大学成立了“科学元勘小组”,自称其学科为“科学知识社会学”,主要代表人物为大卫·布鲁尔、巴里·巴恩斯等。

根本上彻底抹杀各种科学知识的客观内容和存在基础,这样就导致:人类总体性知识基础的彻底相对化,人类的一切知识所具有的客观性和普遍性,也就“烟消云散”了。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尤其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波普的测不准原理等所揭示的现实事物的相对性、非确定性、不完全性,破坏了人们旧有的确定性的世界观,为后现代主义批判认识论的客观主义提供了证据。近代哲学赖以建立的两大支柱——力学和数学的倾斜使旧有的世界观失去了依据。传统的科学形象解构了。

此外,后工业社会作为信息化社会,知识的传播形式发生了改变,知识只有被转译为信息量才能进入新的渠道,信息爆炸使得旧有知识体系破碎了。知识的性质也不再如故,如果以前人们对知识的追求是为了获得客观性真理的话,那么现在的知识则是为了出售而被生产,为了在新的生产中被增殖而被消费,在这上述两种情形中,它的目的都是为了交换,而不是以自身为目的,因此它失去了自己原有的“使用价值”。^{[12] (P3)} 在后工业社会里,知识的地位发生了变化,知识不再以自身为目的,而是以出售为目的,知识被商品化了。认识论的问题也不再是“什么是真的”,而是“什么是有用的”。受后工业社会的影响,哲学观念发生了变化。如果说传统哲学强调的是普遍化、总体化、同一性、本质论和基础论,那么,进入后工业社会以后,这种哲学观念被颠倒了,取而代之的是后现代主义所推崇的多元性、差异、非中心化、混沌、不确定性等。“后现代主义并没有显示解放的前景——一个没有统治的社会的前景。后现代主义放弃了现代主义对于人类解放的幻象,而支持解构虚假的封禁,努力开启现在和未来的社会可能性以及在霸权主义的话语设置了封禁和僵化秩序的生活方式中发现流动性和松散性。”^{[13] (P160)}

四、小结

由于产业结构、社会生活、传播方式、意识形

态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矛盾暴露无遗,这使得近代以来形成的,认为艺术、技术、知识和自由的发展会带给人类好处的信念受到了冲击,减少了西方所持有的对人类普遍进步原则的信心。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后现代主义应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而产生。在《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①一书中,伯恩斯坦描绘了在知识和文化生活中弥漫的一种不安气氛,这种不安气氛使得人们从对基础、方法以及评价的理性标准所拥有的自信走向怀疑主义,体现在哲学上就是人们对超越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的需要;……这种运动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所展示和反映的是代表我们理智及文化生活特征的一个现象,是资本主义进入后工业阶段在哲学上的反映。

参考文献:

- [1] 詹明信.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3.
- [2] 波德里亚. 消费社会[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 [3] 贝尔.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2.
- [4] 郑乐平. 超越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6.
- [6] 弗罗姆. 健全的社会[M].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7.
- [7] 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 [8] 李泊言. 绿色政治——环境问题对传统观念的挑战[M].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0.
- [9] 霍克海默, 阿尔多诺. 启蒙辩证法[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0.
- [10] 康德. 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8.
- [11] 王治河. 扑朔迷离的游戏[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6.
- [12] 利奥塔. 后现代状态[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7.
- [13] 塞德曼. 后现代转向——社会理论的新视角[M]. 沈阳: 辽宁出版社, 2001.

责任编辑: 杨 旻

^①在《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一书中,伯恩斯坦虽然没有对后现代主义予以描述和分析,他所谈到的几个哲学人物也并非后现代主义阵营中诸如福柯、鲍曼等重量级人物,但他的字里行间渗透着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其所形成的反思和批判与后现代主义的主张有不谋而合之处。

of synthesizing the data , as well as his apprenticeship with great masters including Zhu Xi , Lv Zuqian and Zhen Dexiu , and his glory class origin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of wide learning and great literate”.

New Exploration to the Origin of Chinese Ancient Rites

ZHANG Hong¹ , MA Ting-ting²

(1.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 University of Jinan , Jinan 250022 , China; 2. History and Culture Institute ,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 Wuhan 430079 , China)

Different ideas were discussed about the origin of Chinese ancient rites , not all of them were right . Researchers are confused by these problems , which lead to the arg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Chinese ancient rites. when we analysed several problems , we found that some people mixed the “origin” and “basis ” of Chinese ancient rites , and misunderstanding rose. In this article problems are clarified to explore the origin of Chinese ancient rites: What is Chinese ancient rites; What does Chinese ancient rites content; What do “origin” and “basis” mean . We can draw conclusion that Chinese ancient rites originated from sacrifice , created on the basis of emotion.

Analysis on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the Rise of the Postmodernism

DU Yi-fen

(School of Law , University of Jinan , Jinan 250022 , China)

As a wide range of ideological movement , the development of postmodernism is close to the age. As the product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 postmodernism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feat of modernism and classic science. With the great changes in industrial structure , social life , and ideology sphere , the capitalist societies were full of cultural conflicts. And then postmodernism rose.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a Literature Review

YIN Jian-hai¹ , ZHOU Yong²

(1. Station for Applied Economics Post-Doctorate ,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 Beijing 100081 , China; 2. School of Business , Tianji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 Tianjin 300387 , China)

With global economy being integrated , organization is confronting competition , which requires employees in organization work in a spontaneous , active , proactive manner. Therefore it is a new direction in studying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to understand motivating factors of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OCB) and exploring measures to motivate exhibition of OCB by employees effectively. From two perspectives of social psychology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 the main literatures on the study of OCB are reviewed. Furthermore , significant motivating variables which influence OCB are recognized and classified , which include individual and situational variables. At last , the limitations of existing studies are analyzed and the further research trends are suggested.

(Edited by YANG Min)